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主编 许明 马驰

马克思主义与 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

战火洗礼 (1937—1949)

徐清泉 文学武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主编 许明 马驰

马克思主义与

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

战火洗礼 (1937—1949)

徐清泉 文学武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火洗礼 : 1937 ~ 1949 / 徐清泉, 文学武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6

(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艺活动 / 许明, 马驰主编)

ISBN 978 - 7 - 215 - 09402 - 4

I. ①战… II. ①徐… ②文… III. ①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史 - 1937 ~ 1949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357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 450002 电话 : 65788068)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98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99.00 元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从课题设计到全部校对完成交稿,历时5年,涉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上海大学5个学术单位,分别由多位教授主持各卷。现在终于完成并与读者见面了。

20世纪的中国,云谲波诡,历史事件众多。在这万花筒式的历史演变之中,有一道亮丽的目标明确且成就辉煌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发展,这是与20世纪中国历史事件血脉相连、相融为一的一股清新的文艺主潮,同时又是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百年里,事件迭出,人物诸多,佳作连篇,义薄云天!马克思主义指导人们进行革命活动,改造了中国;同样,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历程。

文艺本来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有机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史前人类就开始有初级的文艺活动,宗教活动、物质的劳动活动等构成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文艺的首要的基本作用是宣泄情感,陶冶情操。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劳动者唱的原始歌曲和跳的原始舞蹈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非功利的情感生活。但是“传统性”“非功利性”并不是文艺活动的全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阶级、阶层、利益、战争等诸多问题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产生了,有了这种复杂的、政治性的实践,文艺尽管仍然存在,但从此并不“单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文艺始终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的情感宣泄,不再简单地与劳动相关,而是与社会生活相关。

当然,美是文艺生而有之的属性,离开了美就不能称其为文艺。一方面,中

国的文艺离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审美理想,脱离了这一点,文艺就失去了本性。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唱主角的文艺都是密切关系人的命运、时代的风云的文艺。我们所读过的《十日谈》《怎么办》《青年近卫军》《子夜》《阿Q正传》等世界名著,都是充分“入世”并有着深远社会影响的文艺杰作。世界文艺史证明,文艺具有两种功能:审美的功能与社会的功能,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是在能见到的人类社会历史中长存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20世纪的文艺活动史,它既是一部产生过《阿Q正传》、《黄河大合唱》等巨作的可以与世界顶级艺术相媲美的艺术史,更是一部掺杂了血与泪的战争史,它更重要的使命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这是无法回避的中国20世纪文艺的历史性命运。

文艺参与了社会改造与政治运动,这是中国20世纪文艺活动史的一大特点。它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真正成为战斗的“匕首与机关枪”,以至于文艺家屡屡被卷入政治旋涡,或被枪杀,如“左联”五烈士,或被“坐牢”,或被政治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或被“运动”打入十八层地狱,这都是这个世纪文艺活动与政治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铁证。

与20世纪中国革命文艺活动息息相关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及其对文艺活动的深刻影响。关于这一点,此套书有详细的描述与论证。而我在总序中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不是铁板一块,一百年不变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曲折发展、逐步成熟、历经反复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来讲,并不是一个天然可以拿来使用的武器,它有一个被逐步中国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从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来自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碰撞是有一个相异、相斥、相融的客观历史过程的,其间不乏激情与畅想,但更多的是沉重的思考与试验。纵观百年历史,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有着复杂的变化和发展的,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曲折的。这与任何外来思潮在中国落地后的命运是一样的。

作为西方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20世纪的中国独领风骚,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研究课题,应当另文阐述。但为什么在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能为主流政治力量奉为宗旨并践行不息,内中定有缘由。科学、实事求是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这是21世纪的

我们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起,它就被本土化和“被改造”了,诞生于欧洲文化土壤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对最初的中国革命者来讲,是解放的武器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因此,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诸多文化因素中,中国的革命者最先选择了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这一民族革命、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完全可以被后人理解的。

然而,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比我们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原初设想的要复杂、曲折得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育发展,其曲折的过程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料想不及的。在种种危害性的倾向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苏俄经验的倾向,它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惨烈的损失和付出了血的代价。教条主义倾向也反映在文艺活动中。正如本书所披露的那样,“左联”时期的革命文艺家组织中出现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不顾中国国情一味要求“无产阶级斗争”的倾向,不讲艺术性只讲政治需要的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革命文艺活动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左”倾政治路线曾经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文革”十年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全民的文艺活动被扭曲成为“八个样板戏”和三突出的“高大全”形象,使得20世纪中国革命文艺活动被抹上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笔。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能留下辉煌的一笔,内中主要原因是它坚持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核心价值”。“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根本宗旨,同时又是行动的指南。尽管20世纪政治风云诡谲,变化多端,但共产党人坚持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大原则,总能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并逐步赢得胜利。

从文艺活动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中国20世纪文艺活动,是积极入世的,干预生活的,引导精神发育的,而不是躲在“小我”的精神世界中自我陶醉的、无病呻吟的。所以,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融在一起的组成部分,这是已经翻过一页的20世纪的中国文艺活动史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重温和再写20世纪中国文艺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历史,是重温和再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一次义无反顾的选择:为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而战的动人心魄的历程。

1978年启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20世纪的中国文艺活动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又更为复杂的历史时刻。较之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历史进程,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搞社会主义是一项更为复杂的事业。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处在更加复杂微妙的历史关系之中,这一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每一个关注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人们高度重视。

在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文艺活动还有没有作用?还能不能起指导作用?这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风潮涌动》描述了新时期文艺运动的发展因素,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文艺活动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然而,这仅仅是一场伟大历史实验的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远远没有暴露出来并得到深入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就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活动而言,在和平发展条件下的当代中国面临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尖锐挑战。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个人”“自由”“利益”“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矛盾吗?如果这两者是可相融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来,并付诸新的实践。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实践,当前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话题在中国理论界被再三提了出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一个新的尝试和必要的选择。

在战争年代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战的中国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性质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又如何与“市场的社会主义”建立必然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发自运动内部的和出自历史深处的?这样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发展格局。棘手问题的求解途径在于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内部天然包含的继承了欧洲人道主义内涵的元素,并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解放”的价值回归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在这一点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前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的指导下成熟起来,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化发展所获得的崭新的精神环境和历史氛围,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可能的新的出发点。当然,这个新的开局将是困难和充满未知数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不能顺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国如果不能为了“人的解放”而作出辩护,还有什么必然存在的意义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在21世纪的中国文艺活

动中,必然获得重生,它的“为了人”的社会性总体关怀是不可磨灭的,是与人类历史的健康发展永恒相伴的。

是为序。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everal fluid, connected strokes.

2017 年夏

绪 论

为民族独立、和平民主而歌与呼

1937年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多的解放战争。这个时期是革命文化发展历经磨难、百折不挠、艰辛成长、终达盛势的时期。革命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肩负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显得特别艰巨。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经受住了炼狱般的考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烧杀劫掠的疯狂侵犯,誓死不低头、不屈服,硬是凭着革命战士敢于作战、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凭着中华儿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志士仁人一道,经过八年的持久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者赶出了国门,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最终破灭。对中国人民而言,抗战的结束只是完成了炼狱的第一阶段考验,也是最艰难的考验,接下来发生在1945年至1949年间的解放战争,则是为期四年多的第二阶段炼狱考验。整个经历形同“凤凰涅槃”,对此期的革命文化来说更是如此。

发生在1937年到1945年间的八年抗战,是直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面对抗战,除了极少数是非不分、丧失人格、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外,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在此时此刻,大多都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兴亡为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政党、集团、种族和阶层的利益纷争焦虑,抱着一致对外的态度,全力支持抗战。其中有以人力、物力、财力的方式对抗战的物质实力支持,更有以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美术、戏剧等文化艺术样式为载体而展开的文化精神支持。为抗战提供特定的文化精神支持是这一阶段革命文化活动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当时陆续涌现出了一大

批献身革命文化活动的志士仁人,他们借助各类文化艺术样式和文化活动载体,发挥“以笔为旗”“以文字为匕首投枪”“以歌咏为号角”的巨大威力,试图警醒国人、清算日伪、呼唤自由。其一系列革命文化活动的鲜明突出的主题聚焦到一点上,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唤醒民众,投身抗战”。在此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三股:第一股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其中尽管不乏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和进步力量,但是国民党右派顽固势力却也在事实上成为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阻力;第二股就是以毛泽东为领袖、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进步力量;第三股就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扶持的以卖国贼汪精卫为首的汪伪傀儡反动势力,它和日本帝国主义一道,成为了此期中国革命的真正敌人、最大敌人。在中国面临存亡危机的八年抗战这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巧妙把握住了由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这个特定机遇,通过策略性的调解斡旋,最终迫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走上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联合抗战”的道路,从而通过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扶持的汪伪反动势力。

毋庸置疑,在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中,革命文化在抗日斗争实践中不断风起云涌、不断发展壮大,它在客观上成为唤起中国民众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奋勇牺牲、争取胜利的先锋号角,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捍卫自由、保卫家园的精神力量。假如单纯就军事斗争而言,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正规军,在事实上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抗日主力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在事实上成为侧面战场和敌后抗日生力军。不过,当人们从革命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成为领导革命文化特别是抗日革命文化的核心力量,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以计数的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不懈奋战,才为整个中国营造了一个群情激奋、全民抗战、一致对外的革命氛围。由于这一氛围的存在,中国人民才看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败神话的希望,才增强了克服艰难险阻、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力量。尽管在国民党抗日阵营中,也诞生了不少有助于革命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骨子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基本上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一边受形势所迫不得不抗日,一边不忘排挤打压共产党,因而由之引发的磨擦和内耗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革命

文化成长壮大的障碍。也正因此,国民党不可能承担此期中国革命文化成长发展的领导力量。这正像毛泽东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①显然,毛泽东早已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党等势力集团在中国革命文化中的作用,称其“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而真正的领导主体“盟长资格”“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即落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肩上。毛泽东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充分分析,充分肯定地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②在论及抗战时期革命文化的具体任务、具体目的时,毛泽东这样指出,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③。显然,按照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成为了当时的主要矛盾,革命文化的革命特性越发凸显出来,使文化服务于革命这个大局,自然成为所有担忧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正义人士的自觉期待。于是,八年抗战时期的革命文化基本上全力以赴聚焦抗日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常态下的歌舞升平、风花雪月、家长里短和娱乐消遣。在此情形下,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一批又一批的文化战士,借助于形态各异的文化载体、文艺样式、文化活动,通过与全体抗日民众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开拓,创造了缤纷多彩、无可替代、蔚为壮观的时代景观。

发生在1945年至1949年间的解放战争,则事关中国人民选择走何种道路,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八路军的宣传队

事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显然,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转换到1945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革命文化的活动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八年抗战期间,在国难当头的客观形势逼迫下,因为有国共合作的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使来自不同党派、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爱国民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搁置差异、顾全大局,相对集中、相对专一地聚焦抗日救国这个宏大主题。在此期间,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比之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更显迫切重要。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尽管革命的任务依然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此期首当其冲的敌人已经转换成了代表中国封建主义利益、代表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蒋家王朝,以及隐藏在其身后、充当后盾的美帝国主义。国共和谈的破裂预示着国共再次合作失去了最后的可能。革命文化活动内容转换到了劳苦大众力争当家作主、选择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方面。革命文化活动的主体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全国爱好和平民主的广大民众,其范围覆盖到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行业领域,相对而言,以蒋介石为首的谋求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则成为此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敌人,自然也成为此阶段革命文化活动需要攻克的最大敌人。同时也应当看到,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沦陷区人民,依旧生活在国统区的人民,都或多或少地对国民党抱有一定的幻想,即使是

在生活于解放区的部分群众中间,也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形势和未来抱有一些模糊认识。诸如此类的众多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文化活动的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那就是如何让生活在不同区域里的人民能够擦亮眼睛、认清形势、统一思想,为中国寻找一个光辉的前程。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们懂得如何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之上来看待中国的前途。为此,他们在解放区率先实施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旨在保护和扩大民众利益的举措,这就为解放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赢得了民心。毛泽东在分析人民觉悟、抗战果实及宣传工作时这样明确指出:“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①显然,“扫除”“人民脑子中的落后东西”并不像用扫帚打扫房间那样简单,但在选择和确定中国的未来前途的关键时刻,革命文化的鼓动宣传显得尤其重要、尤其迫切,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心的向背,因此明知任务艰巨也要知难而上。为此,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由她领导下的革命文化战士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广大民众,下定决心要对追求正义的解放战争提供文化支持。这种文化支持的主要方式,就是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推翻三座大山、争取和平民主为主题的文化艺术创作宣传活动方面。所涉范围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美术、音乐、戏剧等文化艺术样式,以及围

^①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页。

绕它们所产生的文化运动。

相对而言,以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主体的革命文学创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发挥的唤醒民众、鼓舞士气、震慑敌人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这在客观上使革命文学以及围绕革命文学所产生的人物、思潮和事件等,成为 1937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革命文化活动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当然,除此之外,此阶段聚焦革命文化主题的电影、美术、音乐以及其他各种形态各异的文化载体活动,也成为缤纷闪烁、引人关注的革命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整个中华民族正是因为受到了革命文化掀起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的惊醒、激励和鞭策,才形成由中国广大民众所组成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总体革命格局。在这个格局中,革命文化从星星之火到革命烈火遍及全国、蔚为壮观,直接成为中华民族对敌开展轰轰烈烈的军事斗争的坚强后盾。毋庸置疑,革命文化对先期的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以及后来的推翻蒋家王朝、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报纸《抗敌三日刊》

处于不同革命阶段的革命文化具有特定的任务目标和形式内容,而具体的革命对象、革命区域和革命形势等要素,又对革命文化所涉及的具体文艺载体、

文艺样式、文艺活动乃至文艺人物等产生情况不一的影响。仅就具体的客观区域而言,在八年抗战时期,泱泱中国就被分割成沦陷区(也称敌占区/日寇占领区)、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等三个不同区域,而且前两个区域明显存在着以红色革命为大敌的白色恐怖。即便在此阶段,国共合作抗日成为革命文化活动的基礎,革命文化活动中也融进了国民党进步力量,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尽管他们也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投身抗战)排挤打压共产党及其革命文化活动的恶行并没有停止。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革命文化活动依旧在此三个区域里呈潜滋暗长乃至英勇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不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红色革命文化活动,还是民间出于公理道义诉求的零星自发的红色革命文化活动,大多都不约而同地以殊途同归的方式聚焦同一个时代主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歌哭与呼告,只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着地域性、策略性及个性化的差别。

到了为期近五年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于1945年战败投降,原有三个区域实际上变成了国民党管辖的国统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双峰对决的两个区域,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走向,成了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这时的红色革命文化活动已将具体的时代主题转换成了呼唤人类和平、追求民主平等、追求自由发展。在此情形下,不仅民间的力量表现出这种倾向,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红色革命文化主潮也尤为如此。后者把奋斗目标直接指向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推翻三座大山,指向消灭阶级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由于革命文化力量历经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文化经验,具备了在解放战争时期首先在精神上、舆论上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自信。当革命文化活动全面开展,那些投身革命文化活动的志士仁人,就在实际行动上针对民众主体及社会心理等展开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全方位文化攻略态势,最终使革命文化成为配合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之发展道路的时代最强音。此阶段革命文化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整体走向胜利奠定了最后的基础,它昭示着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经历的凤凰涅槃时期最终结束,它为此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应当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化具有十分独特的形态特征,

因为在此期间,革命的任务变得异常的艰巨和异常的危急,文化及其由之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则成为营造革命氛围、宣传革命理想、鼓舞革命士气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地成为此时期革命文化活动的领路人和急先锋,他们以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组织发动革命文化力量及认识领会革命文化活动的作用和意义,并为革命文化活动的最终目标描绘出了一幅蓝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不论是戏剧、电影及音乐,还是雕刻及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在这里,毛泽东对五四运动以后 20 多年间的中国革命文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也对具有一定革命性的革命文化楷模——鲁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尽管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但鲁迅身上反映出的对中国国民劣根性鞭辟入里的反思批判,对一些中国人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87—388 页。

主义反动势力的压迫所表现出的奴颜媚骨的不屑一顾,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推崇。也正因为此,毛泽东会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奋勇推进的关键时期明确倡导鲁迅精神,并点明了鲁迅精神和中国革命的新文化的高度一致性。显然,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革命文化经受凤凰涅槃考验的特殊时期。革命的主题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毛泽东在论及这种以革命为指向的新文化时,这样阐述道:“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①

既然这种新文化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使命,那么它的革命性就必然体现在如何使处于当下语境中的各类文化活动、文艺样式、文艺题材等服务于反帝反封建。那种脱离当下语境、不切实际的歌舞升平及无病呻吟的文化活动和文艺主题,就必然与革命文化风马牛不相及。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各样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9—400页。